

# 历史、精神与理想之轮

## ——论表现共产党员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及其价值意义

丁亚平



电影《张思德》剧照

主旋律影视剧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传达美好的情感,往往是通过特定的主题与形象完成的。这之中,表现共产党员形象及其精神取向,鼓舞人们奋发向上,进而成为先进文化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或许是其基本的影像与艺术图记。而且,还需要看到,近十年来,表现共产党员题材的影视剧,尽管通常带有强烈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但其表现的主题与形象却十分丰富,具有着多维度的文化意涵。

### 历史描绘与“象征形式”生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对事件的选择,对人物尤其是党员形象的塑造,对空间和心理的描绘,对矛盾与冲突的设置,对角色精神世界的探求,呈现主流化而又丰富缤纷的色彩与取向。其中,除了《冰山上的来客》、《雷锋》等少数优秀之作以外,表现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占了相当数量和比例。如:《钢铁战士》、《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党的女儿》、《狼牙山五壮士》、《林海雪原》、《革命家庭》、《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等。而到了新时期至上世纪90年代,《归心似箭》、《啊!摇篮》、《南昌起义》、《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八女投江》、《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开天辟地》、《大决战》、《董存瑞》、《大进军》、《大转折》、《国歌》等,同样构成一种较为明晰的创作特征。这些电影作品中,李向阳(《平原游击队》)、刘洪(《铁道游击队》)、李侠(《永不消

逝的电波》)、卢嘉川(《青春之歌》)等共产党员形象性格成长和个性化发展轨迹明显;而从张排长、李连长(《钢铁战士》、《渡江侦察记》)到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都既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又同样富有个性。这样的历史基础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影片,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所展现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形象,给人深深的感染与长久的影响。在这里,题材虽不能决定一切,但它和作者与时代的情绪融合,就会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力与影响力。

在电视剧的创作中,同样不乏对共产党员的热情讴歌与艺术再现。虽然随着近年影视剧市场主体地位的强化,较多地侧重于现实生活的叙事与故事讲述,呈现一种艺术的通俗化和原生的错杂状态,但对历史题材作深具时代意涵和特性的挖掘与表现的成功之作,仍然不少,而且颇具较大的社会影响。如表现革命历史史实与革命英雄主义传奇的《红岩》、《中国神火》、《号角》、《三月雪》、《抗美援朝》、《烈火金刚》、《国家使命》、《红旗谱》、《亮剑》、《保卫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太行山突围》、《雄关漫道》、《沙家浜》、《暗算》、《西安事变》、《井冈山》、《解放》、《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为了新中国,前进》、《长征》、《国歌》、《延安爱情》,表现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政治家活动与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的《少奇同志》、《日出东方》、《朱德元帅》、《陈赓大将》、《上将许世友》、《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在陕北》、《周恩来在重庆》、《叶挺将军》、《中国1921》等,形象生动,在艺术地把

握、表现历史的进程的同时,写出了人物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

这些作品尊重史实,又有所创新,所表现的人物,从深入兵工厂或农村的共产党员,如《红岩》中的余新江、陈松林,《三月雪》中的女共产党员刘云,到舍排长、李连长(《钢铁战士》、《渡江侦察记》)到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都既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又同样富有个性。这样的历史基础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影片,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所展现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形象,给人深深的感染与长久的影响。在这里,题材虽不能决定一切,但它和作者与时代的情绪融合,就会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力与影响力。

### 盛开的花朵

在当代文化建构与发展中,影视剧的创作、生产与传播具有守望、决策、教育、意识形态主导等基础功能,包括真人真事作品创作在内的主流电影、电视剧,在很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表现共产党员形象的影视剧创作,生产组织和传播,具有来在重庆。《叶挺将军》、《中国1921》等,形象生动,在艺术地把

依据真人真事改编,占据一定的数量和规模,而在其指向一种朝向理论实证的当代化的热望之中,现实的召唤与精神之光的贯注,实现了一种更为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和互动。

影片《冲天飞豹》、《紧急迫降》、《生死抉择》、《世纪之梦》、《生死托付》等表现了一个个共产党员的并不普通的事迹。这些作品将主流价值融入感性的个人的历史描写之中,显现出比较强劲的活力,历史视野得到拓展,文化含量不断增加。而《周恩来》、《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下辈子再做母子》、《小巷总理》、《村支书郑九万》、《丛飞》、《公仆》、《真水无香》、《沉默的远山》、《情暖万家》、《戎冠秀》、《郑培民》、《时传祥》、《袁隆平》等,基于真人真事基础之上,努力从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出发,开启主旋律影片创作新思路,运用艺术的形象去做具体的表现,富有新意。

电影《山乡书记》写向平川来到天崖乡担任乡党委书记,带领老百姓修路、搞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走访关心每一户村民,努力让贫寒农民脱贫致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片中的向平川,当了10多年的乡党委书记,历史没有将他塑造成成熟和政教化了的人物,却是时时感喟:脱贫致富,路还很长。

电视剧《远山的红叶》以巴中市南江县原纪委书记王瑛同志为原型,表现了一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干部的人格品质和崇高精神。作品中的一个共产党员,犹如广袤大地上盛开的花朵,开放得如此自然。其形象感性生动、平实伟大,比较符合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

对郎小泉;与贪污分子岳映久的斗争中,在上有保护伞下有黑势力所构成的威胁下,她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在正与邪、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中,其真实的个性和人性光辉得以彰显。王瑛的饰演者颜丙燕表现出色。

电影《第一书记》和24集电视剧《永远的忠诚》,根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原支部书记沈浩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作品由沈浩坚持贴近群众、热心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旁及了农村穷落后面貌和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大学生到农村创业等外问题,内容丰富,讲述生动,不少处理更加人性化。

取材于同一素材的影视作品还有同名的《情暖万家》,它们分别以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秀的先进事迹为原型,通过帮助失去双亲抚养的孩子、丈夫患肾病妻子下岗这样的困难家庭以及遭遇地产商强行拆迁的工厂等具体情节,展现一个用自己的真情和真心付出关爱温暖千家万户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此外,像电影《法官妈妈》、《暖春》、《郑培民》、《任长霞》、《集结号》、《邓稼先》、《铁人》、《第一书记》、《建国大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电视剧《鹰击长空》、《帕米尔医生》、《公家人》、《插树岭》、《石破天惊》、《国家形象》、《省委书记》等,描写相当细腻,富有活力而率真,甚至表现出清新浓郁的时尚气息。作品中表现的一个个共产党员,犹如广袤大地上盛开的花朵,开放得如此自然。其形象感性生动、平实伟大,比较符合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

### 理想之轮

现实——呈现在摄影机面

前,给予了影视叙事的基本框架。可以说,现实和历史生活的无比丰富与深广,为电影、电视剧塑造新的形象、表现理想之轮与精神化情感提供了多样可能性和崭新的空间。在主流影视剧中,无论历史抑或现实的表现,对共产党员的礼赞,作为社会建构机制的一种重要呈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性和革命性的意义与价值。

电影、电视剧作为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扮演的重要角色,人们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它的公共性。反腐倡廉题材在荧幕上持续热播,这既是一个特殊的电视现象,也反映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腐”成为了国家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播出的《抉择》、《红色康乃馨》、《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忠诚》、《至高利益》等作品,塑造了如黄江北、李东方等一批生动丰满、震撼人心的反腐党员干部形象。这些优秀作品和人物形象表明了电视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突破限制、直面生活和触及敏感领域的巨大勇气,也表现出他们善于把握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焦点话题,呼唤人间正气与理想意识。影片《小巷总理》以20世纪80年代北方某城市居民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为背景,描写街道主任谭竹青一心扑在工作上,同样蕴含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与人格理想。电视剧《远山的红叶》立体化地呈现了王瑛的形象:在与贪污分子岳映久的斗争中,她勇往直前、不屈不挠。《能人冯天贵》中冯天贵是典型的农民工,但在他的身上,具有都市人所缺乏的对待生活和责任的质朴态度,对理想生活的勇气和热情。

还有一些表现基层党员干部的优秀作品,如电影《情暖万家》、《记者甘志远》、《张思德》、《孟二冬》、《潘作良》、《奥运高山》、《远山》,电视剧《好人燕居

谦》、《命运》、《共产党员张小民》、《党员二楞妈》、《党员金柱有点忙》、《咱爸咱妈六十年》、《好爹好娘》、《党员马大姐》,这些作品中的基层党员干部以平凡而伟大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崇高,人物大都来自基层,其先进性的品德与理想,不仅要求他们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还要和群众和民生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置身民间与百姓,足踏大地,让人民群众接纳自己,他们的亲切、他们的奉献与付出,让人感到非常可信。由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出发,影视剧主创人员运用影像化的艺术手段,精心创作,集人生态度、社会性和文化本质思索于一体,共产党员不但成为作品表现最重要的故事主角,而且,成为激发编导主创对环境及其意义作较为深入的审视的精神资源。

当前的一些影视剧创作,在近年市场化竞争格外激烈的新语境下,个别历史剧目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而在现实题材影视剧中,一些人往往会将主旋律及其创作理解得相当概念化、简单化、实用化甚至实利化。

这是应该提请我们的某些创作人员注意和纠正的。令人感到可喜的是,近年来,在当代电影电视剧发展、流变中,反映时代精神、切合主流社会发展的影视创作,特别是取材于共产党员题材的作品占据了独特的位置,范本、权威、精英,彰显了理想的最高价值标准和更高道德要求,在其中有着意味悠长的特殊性与价值意义。

### 文艺作品中的共产党员——纪念建党90周年

### 动态

### 日本“人间国宝”谈“狂言”创新

本报讯(实习记者李颖)6月1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名誉教授野村万作讲座暨座谈会”在京举行。刘德军、王能宪、刘祜、丛兆恒、于黛荣等有关领导和戏曲、日本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一起观看了野村万作“狂言”的现场讲演和他与中国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合作演出的《秋江》的录影资料。

野村万作在讲座中谈到,为了“狂言”的传承和创新,他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参演现代戏。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与梅兰芳、李少春、袁世海等中国艺术家的接触交流中,因日本“狂言”与中国戏曲在舞台动作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也使他产生了与中国演员合作《秋江》的想法。讲座最后,野村万作和他的两名弟子现场“讲演”了“狂言”剧目《蜗牛》,他们把剧中的动作和歌谣教给现场的年轻学子们,让他们近距离体验了一把“狂言”的魅力。

专家认为,中日两国艺术家合作的《秋江》依然保持着中国昆曲和日本“狂言”各自的特色,在文化交流融合中,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纯粹性,不要完全变成对方的东西。两国艺术家在表演时配合得天衣无缝,两国戏曲的审美一致性,为戏曲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专家指出,要把像《秋江》这样的经典传承给年青一代人。

野村万作是日本“狂言”艺术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狂言”世家。1998年他与张继青女士合作的《秋江》被人们称颂。通过几十年的舞台艺术实践,野村万作为“狂言”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他被日本政府授予“人间国宝”称号;2009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 时评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开发和利用好红色资源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战略之举。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事业,为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景区,笔者发现了一些令人忧心忡忡的事。

在某些著名红色旅游景区参观,有时就会看到一些参观者或嬉笑打闹,或大声喧哗,或边走边吸烟吃东西;还有的随意触摸领袖人物或英雄烈士雕像,或摆出各种姿势与之合影;还有的穿着仿红军衣服相互追逐。在这些景区周边,也常能看到不少商业店面、宾馆酒店,甚至娱乐设施,与红色景区环境很不协调。

我国红色资源非常丰富。这些革命纪念馆、会议旧址、战斗遗迹,记录着我党我军成长壮大的壮丽历程,展示着无数共产党人探索真理的坚定足迹,书写着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壮歌,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踏入这些红色圣地,需要持有崇敬、缅怀之心,言行举止要与庄严、肃穆、凝重的氛围相称。

当前,各地红色资源开发可谓如火如荼,既可以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又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一举两得。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极少数地方搞红色旅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只是门面或者幌子,拉动经济才是真正目的,这样的开发就变了味。近些年,在一些地方为争夺名人故里出洋相,这样做不但使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传承,反而做出了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情,负面效应很大。红色旅游若单纯地搞“经济唱戏”,红色教育的功能将大打折扣,其结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就我个人认为,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公益事业,而不应简单当做经济产业来衡量。毕竟,开发红色资源的主要目的是让亿万群众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而不仅仅要搞旅游娱乐和发展经济。二者能统筹兼顾、相得益彰最好,但如果发展红色旅游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功能,没能传承革命精神、真正赢得青少年一代,即便拉动了经济发展,这种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也将是短视行为。

谨防红色旅游变“味”,国家有关部门须进一步规范革命纪念馆、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周边的经营项目;制定参观红色景区行为规范,区分不同群体、不同人员、不同职业,对参观红色景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作出具体规定,并广泛深入宣传;要完善红色景区接待服务相关制度规定,不断提升服务层次标准,充分展示红色景区良好形象。此外,还必须加强经常性的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予以制止、纠正,确保红色旅游始终向健康方向发展。

## 红色旅游应突出教育功能

盘龙轩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有画国画爱好,并且转益多师,在绘画圈际甚广,这对“梅迷”而言大概已是耳熟能详了。至于绘画和梅兰芳的戏曲艺术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有一定的影响,不同门类艺术的触类旁通,的确对其艺术修养、审美趣味乃至道德情操有着提升的作用。值梅兰芳逝世50周年,更好地缅怀大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梅兰芳始于1915年的“古装新戏”与他同著名文人画家交往并开始习画,都发生在同一年,这也大致可看做是他对两种艺术的融会贯通之始。有意思的是他对这两种艺术的趣味与选择上的巧合——在传统的基础上改革与集大成是梅兰芳戏剧成就中的两个关键词,他创举性地将南派的昆曲引入北派的京剧,而在他身后出谋划策者,不乏有启蒙者与革新思想之士,如冯耿光与齐如山,他们都主张戏剧应是现实主义的,应该“为人生而艺术”,而不应为“艺术而艺术”。而梅兰芳在绘画上的师友亦是一些既强调传统又试图革新的艺术家,并且跨越南北两派——北京与上海两个绘画圈,这些画家大多都有启蒙与维新的理想,甚至还有政治上的身份。本文拟对梅兰芳在绘画圈中的师友关系及其往来际作一番梳理,来揭示梅氏在绘画上的趣味。

### 画坛中的师友往来

把梅兰芳带进北京绘画圈的第一人是与其有深交的罗瘿公。罗瘿公青年时期就读于广雅学院,是康有为的弟子,早年以诗文与陈散原等齐名当世。还编纂历史笔记《太平天国战记》与《庚子国变记》。正是罗瘿公为梅兰芳介绍了第一位绘画老师王梦白。著名的“宣南画社”是余绍宋等于1915年组织成

立的,王梦白与梁启超、陈衡恪、姚华等都是该社雅集的常客。这个书画圈启蒙维新的背景十分浓厚。梁启超自不待言,著名画家陈衡恪(字师曾)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光绪年间维新运动著名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并因此同被革职。陈衡恪毕业于日本东京师范学院,并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担任中国画导师。姚华当时是北京公认的“画坛领袖”,除了画家身份,他还兼诗人、词曲家、经史学家、文学家及艺术教育于一身。这些画家同时也是北京各大画社、研究会的骨干力量,还在其他的不同场合举办雅集,各有交

## 以俗致雅

### ——梅兰芳的绘画题材趣味选择

马彬彬

通过王梦白的引荐,梅兰芳结识了北京画界中的不少名手,并多有书画馈赠于他。其中还包括樊增祥、齐白石、凌文渊、金拱北、徐悲鸿等人,而并称“京师四大家”的陈师曾、齐白石、凌文渊与陈半丁,梅兰芳皆与交厚,并专门拜齐白石为师学画虫草。另外,梅氏跨越北京与上海画坛的际与趣味亦始于王梦白,王氏本人即宗海派大师任伯年,并得吴昌硕的亲传。早在1914年12月,也就是梅兰芳上演“古装新戏”与正式拜师学画的前一年,吴昌硕将一幅上有于右任题诗的红梅图赠与来沪演出的梅兰芳。此后梅兰芳便与海派圈子中的汤定之、吴湖帆、李拔可、叶恭绰等人多有往来,其中汤定之亦为前述“宣南画社”的指导。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居香港的梅兰芳于1942年返沪,并拒绝登台演出。由于之前积蓄的存款全遭日寇

冻结,梅兰芳的家庭生活举步维艰,他只得变卖北京的房子,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如此还是举债度日,后遂以画为生。此际梅氏“海派”的绘画圈子给予了他巨大的鼓励与帮助。1944年,王梦白、汤定之、吴湖帆、李拔可、叶恭绰等建议梅兰芳办画展。叶恭绰提议与他合作办一个国画展,展出梅、竹的主题,以扩大社会影响。办画展约170件,题材均为佛像、仕女、花卉、翎毛、松树、梅花等。1945年春天,展览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并售出十分之七八的作品。

似乎由此可知梅兰芳在这两种艺术上的趣味正好相反,不过显然他在两种趣味上的选择目的都是希望能够赢得市民阶层的认可。就梅兰芳本人而言,他平和而善于人际交往性情也使他成为能调和各派艺术的集大成者,这种性情自然也影响到他在绘画趣味上的转益多师,南北风格皆为其所用的取向。就社会学的层面而言,梅兰芳对艺术取向的思考与选择契合了启蒙与维新的时代精神,可以看到,他在画坛的师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强调“变革”的重要性,这种倾向无疑也暗合于他对戏曲的态度,因此他对师友圈的选择无疑是有一层精神层面的原因的(齐白石以“衰年变法”而闻名)。这种坚持人民性的取向不仅使梅兰芳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与市场,在新中国亦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这其中虽然有个人的天赋与努力,但也与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成为主流紧密相关。

### 南北两派的调和

通过对梅兰芳在画坛中的师友往来的简单梳理,我们会发现,他的绘画交际圈里都是文人画家,而在绘画中他最初接触的也是尚平淡而有庙堂之气的北方文人画,而对文人画家而言,最重要的题材与最高的趣味和境界便是山水画,尤其是水墨山水,同时还强调书法修养。但梅兰芳终生只画花鸟竹菊与仕女佛像,甚少在山水画与书法上下过功夫。在实践中他明显偏好视觉效果比较强烈的海派绘画,比如花鸟,尤其是设色的梅兰竹菊的小品与仕女佛像,他的画作主要集中在这些题材之上,其对海派绘画的重视而易见。海派绘画的题材较之山水画有着更为轻松的可读性,这是缘于上海画派从诞生之初便是服务于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设色梅兰竹菊与人物画具有更鲜明的装饰效果,易为市民阶层所接